

■ 八一战旗飘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

1927年8月1日凌晨，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，宣告着不畏强暴、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。此后，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证明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……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，为着全民族的利益，而结合，而战斗的。

八一凌晨的枪杆子宣言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夏至刚过，南昌城进入梅雨季节。雨时歇时急，整个城市的热气渐渐被压制下去。

时光回溯90年，那个8月1日的凌晨，南昌城墙内外的居民们，被阵阵枪声吵醒。零碎的射击声，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，犹如除夕夜的鞭炮，满城沸腾，一共延续三四个小时。胆子大一些的老百姓，爬起来挤着眼从门缝里往街上看。此时，街上已经戒严，没有一个人，偶尔传出来“不准通行”的呼声。

原来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以“河山统一”为口号，领系红领带，臂扎白毛巾，在贴着红十字马灯和手电筒的光影中，向南昌城内外外的守敌发起猛攻。经过浴血奋战，天亮时，起义军占领了全城。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里吐出的火舌，宣告着不畏强暴、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！

“假革命就是反革命”

南昌起义参加者，实际人数是2.3万，大部分人都没能留下姓名。现在我们只掌握1049人的名单。”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。

从地域来看，南昌起义部队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广东的人最多，山东籍只有5人。“按当时的籍贯，他们分别是海阳人王源魁、郟城人冷相佑、博山人谭克平，还有卜心田、秦基林两位，有关他们的资料非常少，有的没有具体出生地，有的则不知道出生日期和牺牲日期。”肖燕燕说。

肖燕燕期盼着能发现更多这5位山东人的线索，丰富八一起义人物史料，以我们的方式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。在这五位战士中，本报曾于今年2月3日，刊发冷相佑：黄埔硬骨头《血染竹竿山》一文，还原冷相佑在起义时的经历。他所在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打得相对轻松，在顺化门外的老营房，将睡梦中的敌人瓮中捉鳖。

肖燕燕的办公室北望，窗户外上清一色内嵌“八一”二字的五角星半透明窗花，窗外西面便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。自去年10月底至今今年7月31日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直在维修中。最显眼的建筑是起义总指挥部旧址，昂然屹立在绿色的防尘网中，如同穿着军装。

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，原为江西大旅社，始建于1922年，至1924年建成。这是一座银灰色、回字形的中西合璧砖混结构建筑，主体建筑共4层，坐南朝北，屋顶是一个大平台，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。”肖燕燕介绍，当年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豪华旅社，是江西民国时期的三大建筑之一。

1927年7月26日、27日，叶挺、贺龙部队先后到达南昌。贺龙所率第20军第1师把江西大旅社整个租下来，在大门口挂上师部牌子，并派卫兵严加守卫。7月27日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在大旅社内宣告成立，大旅社正式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。

起义前后，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就是前委会议室。会议室旁的9号房间是起义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——军事参谋团办公室，参谋长刘伯承在此办公。一楼还设有警卫队住房，时任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就住在这里。

在担任警卫任务期间，粟裕经常见到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进进出出。周恩来对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，每次走过哨位，总要和战士打招呼。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鲜明对照。粟裕等见到周恩来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，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。”肖燕燕介绍。

江西大旅社的二、三楼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精英。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工农运动领导者，也有中国共产党派来参加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们，还有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。

此时，大旅社的酒楼停止对外营业。精英们在这里商讨斗争策略、交流经验，研究如何开展未来革命工作。整个大旅社都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气氛。

当时，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起义的诸多将领们，起义前是住公馆、前簇后拥的高官。一旦起义，与国民党决裂，他们就一无所有了。可他们仍然“大路不走走小路，皮靴不穿穿草鞋”，毅然踏上追寻信仰之路。

贺龙做国民党中将，享受的是每个月5000大洋的津贴。起义前，蒋介石为了拉拢收买他，更是许以500万大洋，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，可他都抛弃了。参加革命后，他每天菜金是1毛5分钱，和士兵是一样的标准。”南昌起义历史研究者王建军介绍。

贺龙抛弃高官厚禄，心底激荡着共产主义信仰。与他相似的，还有北伐名将叶挺。在起义结束后，叶挺将对革命的感悟写成《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》：“同志们，我们铁军过去光荣的历史，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。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，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：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，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帜，都是我们的敌人……假革命就是反革命，我们万不可为敷衍一切反革命假革命所制造的环境！”

大旅社四楼是政治宣传人员的活动场所。起义前后，这里热闹非凡，灯火通明，宣传人员常常彻夜写标语、传单。南昌地区的群众代表，也频繁进出，积极配合起义军各项工作。

起义胜利后，大旅社便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场所，各种通告、宣言和任职命令都在这里发出。人民军队中第一批女兵们的灵动身



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。

影，也时常在此闪现。

“我已下决心跟党走”

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出来，沿中山路往西350米到子固路路口，再往北500米，便是贺龙指挥部旧址。大雨滂沱中，视线模糊，浑身被雨水拍湿。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的宏道堂及其主办的宏道中学校址。旧址分前后两栋，建筑朝向均为坐东朝西，属于西方建筑风格的红砖木结构小洋房。

当初选择此处落脚，贺龙有着自己的判断：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，过了赣江便到；与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邻街，距离仅有200米。地点适中，一旦起义，将是战斗的最前沿阵地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戎马倥偬半生后，贺龙在1959年初故地重游，参观他当年的二十军指挥部。站在礼堂中央，他看了看四周说：“这是战士开会的地方，还是原样子。”

身边的同志问：“那时召开军官会议，宣布起义也是在这里吗？”

贺龙点了点头说：“是这里，那是7月31日下午4点，我把营以上军官都找来了，讲了四点：一是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，国民党已经死了；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中国才有希望；三是党已决心领导武装暴动，解放人民；四是我已下决心跟党走走了，愿意跟党走的，可以留下继续革命，不愿意的也可以走。”

接着，贺龙笑了笑说：“结果大家都愿意参加起义。”

在中学校操场的围墙上，钉着一块说明牌，写着“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”。贺龙读过后，对大家说：“这样介绍不全面，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。那时我还没入党，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，帮助了我，改造了部队。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。”

至今，南昌八一纪念馆还陈列着贺龙的党员登记表，记录着那段血汗与信仰凝结的峥嵘岁月。贺龙在回忆自己入党时，曾说：“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，那是假的，但十几次总是有的。因为我是军阀，所以入党特别难，党要考验我。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到我们部队工作时，有一次我去找他，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，宣誓党的都是我的部下。事后我对他说：‘老周啊，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，也让我进去嘛！’”

党的考验，随时随地，天知地知。1927年8月1日凌晨，南昌起义第一枪在藩台衙门打响，由跟着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老兵打头阵。贺龙、刘伯承、周逸群站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亲自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战斗。

由于敌军事先得到了叛徒的密报，抢占了鼓楼、端表楼等制高点。起义军左攻右击，付出很大伤亡，仍没能接近大门的洞门。敌人的六挺水机关枪，一个劲地朝着正前方横射猛扫，顽固地抵抗着。

贺龙等人沉着指挥，当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，他派自己的警卫连冲上去，终于攻克南昌城内兵力最强、最顽固的敌人堡垒——敌总指挥部。

据当时的亲历者刘屏庚回忆，在天亮之前，贺龙说道：“快结束了。”

待故地重游结束时，贺龙一行人走出二十军指挥部大门。随行的同志请贺龙看一下二楼窗口的弹痕，贺龙兴致勃勃地数着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”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是那个晚上打的。”

机关枪挥洒“铁军”风采

从江西大旅社旧址往东行一公里，在百花

洲东畔的南昌市第二中学操场东侧，绿树掩映中，有一栋“工”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，这便是叶挺指挥部旧址。楼前有一棵百年树龄的香樟树，巨大的树冠铺在楼顶，遮蔽风雨。当年，这棵大树还很瘦小，却见证了在小楼内外进进出出的指战员们。

1927年7月下旬，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从九江赶赴南昌。当时正值暑假，叶挺便将指挥部设在心远中学的校舍中。楼上是军部办公室、会议室和电话总机房，楼下是警卫连、通讯班和特务连住房。

7月30日下午，这座小楼上下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。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，有40多位青年军官到会。为了保密，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。

会上，叶挺传达了党关于起义的决定及前敌委员会对形势的分析。他指出：“汉合流，已成定局，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。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，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往南昌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，挽救目前的危局。”与会军官多是共产党员，他们对前委的部署一致表示拥护。”王建军介绍说。

7月31日18时，周恩来和叶挺到24师教导大队营房视察。“枪支是否擦干净？手榴弹是否会用？”当时的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李逸民曾回忆道。

随后，周恩来进行详细布置：“今晚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，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领带、右臂扎白巾、电筒玻璃贴有红十字的部队，就是自己人，不准开枪。没有这些标记的，碰到就打。”

起义中，叶挺指挥第24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、匡庐中学、贡院、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敌军。第24师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所向披靡，再一次展现“铁军”风采。

在松柏巷天主教堂、匡庐中学一带，我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了激战。起义战斗打响后，敌军关起大门，调集轻重机枪，架在天主教堂钟楼上，封锁了松柏巷。一支由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，冲开了敌军牢固防守的天主教堂大门，另一部分官兵也翻越围墙，从背后夹击。

我军将士爬上天主教堂的钟楼，夺过敌人的机枪，调转枪口向匡庐中学的敌军猛烈扫射。当时在松柏巷天主堂厨房工作的李桐森，曾见证这一激烈场景：“起义军在楼上架好机关枪，进入战斗前，还特地来到厨房叮嘱我们不要怕。战斗开始后，只听见楼上的机枪叫得欢，匡庐中学内外的反动派也作一些抵抗，但打不过起义军。”

匡庐中学是所有战斗中打得最激烈的地点，一直恶战到天亮。

在贡院战斗中，我军七十二团在水观音亭设置了机枪火力点。当被机枪火力轰击追赶的敌军掉过头来，向我第七十二团团部方向猛扑时，守卫在团部的只有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和十几名学生兵。

在短兵相接的搏杀中，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，而身先士卒的陈守礼也连中数弹牺牲了。正在敌人又开始猛烈冲击，仅仅三四十米远了，眼看难以守住。就在这当儿，突然枪声大作，二营营长李鸣珂率领大队人马杀了回来，扑向团部的这股敌人很快败下阵来。

放长线钓到两个团

从叶挺指挥部旧址出来，顺着百花洲公园朝北走，到民德路东折150米，便是朱德旧居。整栋房子坐西朝东，青灰色的墙面、高高的马头墙，走进进去便是满是青苔的天井，雨滴如丝丝缕缕，飘飘洒洒。静谧而古朴的朱德旧居，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模样。

1927年1月，花园角2号的这座新房迎来一位新租客，他就是奉中共中央军事部之命来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朱德。为了安顿家人，他将

这套大房子整租下来作为住所。这里出行便利，离军官教育团很近，便于开展活动。因此，这所房子也就成了当时南昌一处重要的革命活动据点。

肖燕燕介绍说，朱德对南昌的情况非常清楚，各方面关系又熟悉，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，他为发展和保护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。

朱德在南昌开展革命工作的同时，为党内人士和革命群众提供了许多便利。1927年3月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南昌。蒋介石到达南昌后，立即与当时在武汉实行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裂，并着手反共清共。

郭沫若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极为愤怒，决心以最快速度撰写一篇文章，揭露蒋介石的五恶嘴脸。他找到朱德，希望有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环境写作。朱德十分支持，就在自己居所的二楼空出一间房间，供郭沫若居住、写作，还派出自己的警卫员照顾和保卫。

不久，郭沫若就在这里撰写了轰动全国的《讨蒋檄文（请看今日之蒋介石）》和《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》。“蒋介石已经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，蒋介石是流氓地痞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、卖国军阀、所有一切反动派——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。……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，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，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，拥护中央，迅速起来反蒋。”在朱德旧居中，郭沫若用笔头将蒋介石反动派的行径一一揭露，为推动革命前行起到宣传作用。

1927年7月，朱德为八一南昌起义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。他利用与第三军上层军官的关系，探明敌方兵力部署；组织群众欢迎“铁军”，为叶挺、贺龙部队寻找驻地；安顿初来乍到的周恩来等人，帮忙寻找合适住所。

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厅堂里。朱德还亲自下厨招待周恩来，与周恩来一起研究起义作战方案和具体部署，讨论革命的道路和未来。

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，朱德主动提出“设宴请敌军团长，加速瓦解敌军”的妙计，为起义增添了光彩的一笔。1927年7月下旬，朱德开始主动与滇系军官加强联络，多次宴请第3军23团团长卢泽民、24团肖团长。这两人的部队是当时南昌守军的主力，拖住他们的团长无疑是起义时事半功倍的办法。

放长线，方可钓大鱼。7月31日中午，朱德再次宴请两名团长，并事先嘱咐警卫员刘刚把枪擦好。宴请的地点在当时的大院32号，当时是南昌有名的餐饮娱乐场所。

临近中午时，两名团长赴宴，朱德忙招待两人吃饭，并在饭后安排他们打麻将。利用两名团长打麻将的时间，朱德悄悄赶到了贺龙20军指挥部，与后商商量好行动时间后迅速返回。

在返程中，朱德嘱咐刘刚，黄昏后要禁止所有人进入大院32号，如有人找他们，就说他们已经回家了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刘刚还在朱德授意下，将两位团长的卫兵安排到附近的娱乐场所中。

当天下午四点钟，起义军中有叛徒向敌军告密，敌军便派人前来寻找两名身担重任的团长。“幸亏当时守在门外的卫兵拦住了他们，朱德立马察觉到起义消息走漏了，便谎称转告给两名团长。其实，他紧接着就派人告诉了刘刚。”王建军说，正是这个小插曲，使得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，“如果给敌人的准备时间足够充分，后果将难以预料。”

时光在游戏老总行进得更快，守城敌军主力部队的两名团长在悠闲地打着麻将。不知不觉，到了8月1日凌晨，“噼里啪啦”的枪声让他们如慌不择路的兔子，推了牌就往外跑。孰料，等待他们的是朱德卫兵的枪口。“由于长官不在，两个团在起义打响后乱作一团，很快就被起义军击溃。”王建军介绍说。

“有了共产党，就有了灯塔”

从朱德旧居出来往北100米，再往东200米左右，便是闹中取静的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。这里原为江西讲武堂，房屋坐北朝南，是园林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。

古色古香的长廊、绿树成荫的小花园，显得尤为硬朗和凝重。旧址内包括朱德的办公室、教育团会议室、教职员办公室、宿舍以及传达室、通讯班的住房。

旧址中间的一排房屋将院落分为前后两个小院，各部分有走廊相连，前院种有冬青树、桃树，后院稍大，种有枣树、柚子树、石榴树，还有木芙蓉、九里香。

据肖燕燕介绍，北伐战争后期，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1927年初，刚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，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南昌工作。

此时，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伤亡甚大，军长朱培德准备扩充部队，需要大批军官。朱培德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同学。早在读书时，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优，表现出众。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，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指挥。他俩配合默契，指挥有方，时称“模范二朱”。

“模范二朱”在南昌会面，两人无话不谈。朱培德向朱德倾诉：“我部在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中伤亡很大，现任中、下级军官几乎

■ 历史影像



朱德旧居，周恩来到南昌后，当晚就住在这个厅堂里。



南昌起义时使用带有红十字标识的马灯。



贺龙指挥部旧址全景。



叶挺指挥部旧址。

半数以上都是临时递升起来的，对于军事技术、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，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。”

朱德听后，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急于扩充部队、培养大量军事骨干的心理，于是他向朱培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。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，直接授命朱德帮其筹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。

1927年1月，朱德将招募的1100多名学员编为3个营，9个中队（连）。第1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连排级军官，第2营学员主要为原滇军的中士、上士衔士兵。这两个营的学员绝大多数思想进步，倾向革命。第3营学员多为江西各县来南昌投考的知识青年。

朱德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后，积极为第3军和第20军中抽调军官来团部工作。他还聘请一些社会名流任教员，并邀请方志敏、邵式平、曾天宇等共产党员来校授课，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。

朱德非常注重教育团的教学改革。他认为，这样因袭旧制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，只有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，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人民。因此，他将“三操两讲”改为“三操四讲”，增加了马克思、列宁主义的学习内容。同时，以军事训练为辅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。

此外，朱德对学员身教重于言教。当时，身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、南昌公安局局长等要职的他在，在办公室兼卧室里，仅有一张书桌和几把旧椅，睡的是和学员一样的竹片床，穿的是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。

朱德在军官教育团的会上曾说过：“学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，也可以改造。在过去，他们就像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帆船，没有不迷失方向的。现在有了共产党，就有了灯塔，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，绝大部分人可以培养成革命的力量。”由此可见朱德教学改革的初衷所在。

在教育团任职期间，朱德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储备人才。通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，学员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，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小组，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数量迅猛增长。有的连队共产党员数量甚至超过三分之一，先后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。

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由朱培德领导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。朱培德把教育团办成了革命的大熔炉，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出现，有力推动了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。

1927年6月至7月，国民党反动当局策划解散教育团。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，朱德毅然让1营、2营学员提前毕业，3营学员继续留校。之后在朱德的率领下，留下的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。

起义后，教育团学员跟随朱德艰苦征战，到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。星星之火的苗头，从南昌一跃跃动着井冈山，渐成燎原之势……